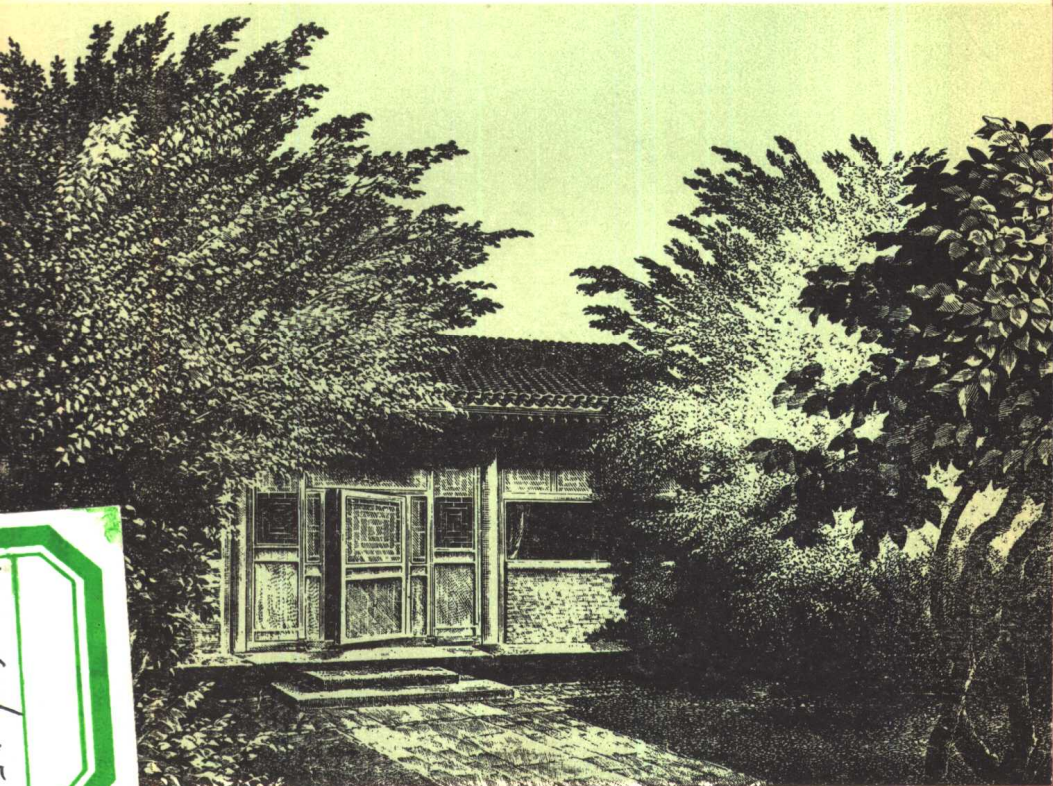


鲁迅在北京

住过的地方

孙世俊著



北京出版社

魯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孙世愷 著

2006/5/6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孙世愷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12/16·字数 12,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统一书号：7071·40 定价：(6)0.09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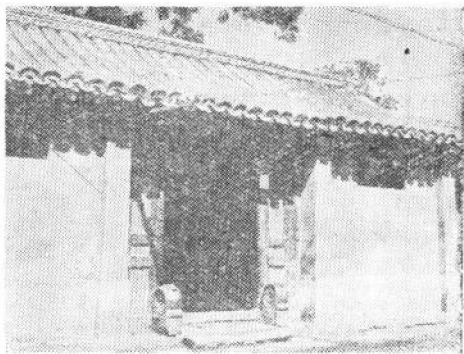
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1
1. 在“绍兴县馆”（1912年5月—1919年11月）.....	1
2. 在八道湾11号（1919年11月—1923年8月）.....	2
3. 在砖塔胡同61号（1923年8月—1924年5月）.....	4
4. 在西三条21号（1924年5月—1926年8月）.....	5
北京鲁迅博物馆.....	8
后记.....	

魯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魯迅先生在北京居住了十四年多。在这十几年当中，拿起他銳利的武器——笔，向旧社会展开英勇的战斗，这个时期是这位巨人在文化战綫上畢生战斗的一段重要时期。在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訪問过魯迅当年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使我对魯迅先生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朴素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欽佩。

在“紹兴县館”（1912年5月—1919年11月）

在宣武門外一条偏僻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我找到了“紹兴县館”，由魯迅当年的兩位老鄰人，引导我先去參觀魯迅在1912年5月头一次来到北京时居住的“藤花館”。那里，原有三間正房，东西各三間廂房，在房东边还有座藤花池，如今都



已經面貌全非了，現在在旧房的地基上盖起了新房，藤花早已枯死刨去。這兩位和藹可亲的鄰人說：“先生在这里沒住

• 1 •

多久就迁到西边的‘补树書屋’。先生当年在这里居住过的三間正房依然保存着，可惜的那株槐树也不見了。”当时，魯迅在教育部任僉事，来往的朋友較少，下班后回到屋里便抄写古書，尤其喜欢抄写并一字一句的校訂魏晉时一位敢于反抗旧礼教和暴虐統治的詩人嵇康的文集和唐以前的古小說。后来对抄古碑文又發生了兴趣，先生这些勤懇的劳动給后来編写“中国小說史略”、“小說旧聞鈔”等書作了准备。这时，魯迅先生的生活是寂寞的，在星期日也只偶尔到琉璃厂旧書店去走走，搜集些古書和古碑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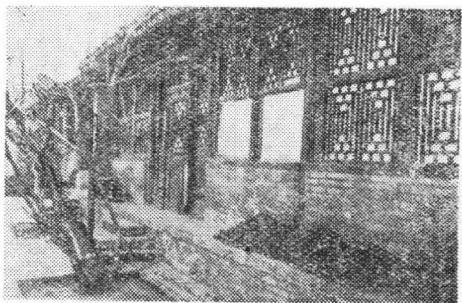
夏夜，蚊子多了，他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树下納凉，从密叶縫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有一天，他的老朋友錢玄同来訪，看了魯迅抄的古碑拓本，在談天的时候就有意劝他作点文章。魯迅一时的寂寞并没有掩住他对未来的光明的憧憬，終於拿起了笔，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开始显示出新文学运动战斗的实績。魯迅借狂人的嘴說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倫理观念——吃人的本質，狂人的發狂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結果。从此，魯迅和中国早期傳播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青年”發生了联系。“新青年”的編輯不断地来催稿，催几次就写一篇，“从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他在这簡單朴素的“补树書屋”居住的后几个月，又写成“孔乙己”和“葯”，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們”。

在八道灣11号（1919年11月—1923年8月）

西城有条弯弯曲曲的胡同叫八道灣，十一号門牌这所房是魯迅1919年的八月把紹兴老家的房子卖掉后买下的，买到

后略加修繕就在十一月由“紹興縣館”搬到这里。現在院內住的周遐寿老先生帶我去看魯迅住過的三間朝北的房子。魯迅在房前亲手栽植的兩株丁香，如今長得枝葉繁茂，院裡還有一株四季長青的柏

樹。不朽名著“阿Q正傳”，就是在这里寫成的。據魯迅自己的文章和熟悉魯迅當時生活的人追憶，那時候，孫伏園先生正在“晨報”編副刊，每周要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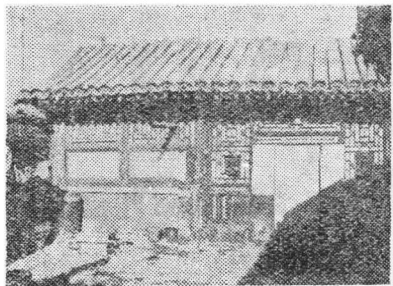


出“開心話”一欄，于是他來邀魯迅寫點東西。先生果然答應了。魯迅自己也曾寫道：“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第一章在晨報副刊登出後，七天必須寫一篇。那時，魯迅雖然並不忙，可是生活頗不安定，住房的前面正是通路，又不安靜。魯迅卻在這樣艱苦的環境里孜孜不倦地埋頭寫作，就是星期天也很少外出，偶爾也只到西郊萬牲園（現在的北京動物園）等地方蹣跚。在創作“阿Q正傳”前後，魯迅在这里又寫出“明天”、“一件小事”、“風波”、“故鄉”、“端午節”和“社戲”等作品。

1920年秋季，魯迅到了北京大學兼任“中國小說史略”課程的教職，後來又應邀到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任教。從那時起，他從自己的書房走出來，步入了青年學生群中，成為青年一代的導師。

在磚塔胡同61号（1923年8月—1924年5月）

魯迅虽然仅仅在一些地方住过短短的几个月，事又隔得这样久远。可是，现在在他居住过的地方的左鄰右舍，談起先生居住的地方还是那样的亲切。魯迅在1923年8月2日的日記上写着：“下午携妇迁居磚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在这里曾住过三間朝南的房屋。房子至今虽保存原样，住户早已更換多人。四年前搬来的一位老太太，虽然不認識一个字，可是她



也知道魯迅先生，热情地向我介紹当年魯迅居住过的屋子，同院的另一个住户还指出先生写“祝福”、“在酒楼上”等小說的房間。“祝福”和“在酒楼上”是魯迅前期創作上的重要作品。先生在这里借居的房間不多，拥挤又噪杂。正如他同年三月作的短篇小說“幸福的家庭”中所写的那样。極極叉叉的木柴放在一起，書架旁边的白菜堆迭成一个很大的A字。这时，先生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正編写“中国小說史略”，校勘“嵇康集”，又写了“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来”等，因此連中間吃飯的屋子也滿堆着綫裝書。另外，还翻譯了許多外国的文艺理論著述。他題“彷徨”集有句詩：“兩間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后来，他的老朋友許寿裳覺得魯迅虽一时感到彷徨，但仍然努力战斗，曾向他說：“你的詩‘兩間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經成为‘兩間余一卒，挺戟独冲鋒’了。”

这时，許多爱好文学的青年經常登門拜訪先生。許欽文等就是魯迅家中的熟客。魯迅不仅热心地接待，还常在深夜里为青年作者們閱改文稿，校訂了孙福熙写的“山野掇拾”等書。在校閱青年作者的作品时，先生費去了很多的力气。正如在“三閒集”中所写的，“即使校对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讀者的。”看到这里，不禁叫人想到早在三十多年前，魯迅就給我們文艺界树立了培养青年作家这种可貴的榜样。

在西三条21号（1924年5月—1926年8月）

每年的魯迅逝世紀念日，人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到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条胡同21号，瞻仰“魯迅故居”。魯迅在1924年买下这所院落，經他亲自設計改建成北屋三間，南屋三間，东西屋各兩間，組成一座幽靜的小四合院。同年五月就由磚塔胡同迁来。現在，房屋的擺設都尽量保持魯迅生前的样子。他亲手在院內栽植的三株丁香也还在。人們由北屋西端的小夾道穿过去，繞到北屋后面的小園內，那里还有他栽植的刺梅。在这个后园里可以看到牆外的树木。魯迅在“秋夜”那篇文章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树，一株是棗树，还有一株也是棗树。”文中所指的棗树早已被鄰人砍去，1956年又补种了兩



株，（一株已死，現剩一株）恢复了往日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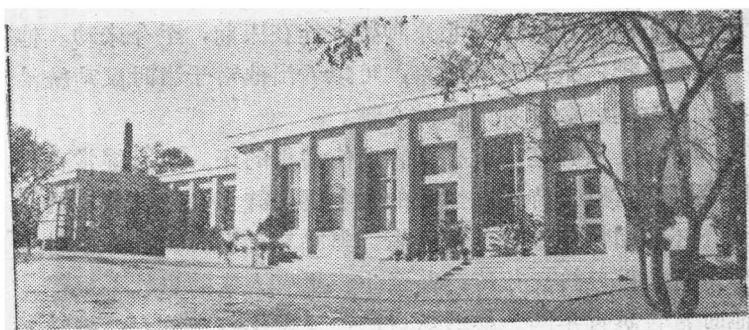
我在这幽靜的后园繞了一周，回到前院，領我參觀的故居管理員便向我一一介紹了当年魯迅居住的情形。他說，北屋的东間原是先生的母亲居住的；西廂房是厨房；东廂房是女工的住所；南房是先生的会客室。在北屋中間又向后园凸出的那間房子，魯迅自称是“綠林書屋”，也被称为“老虎尾巴”，那是先生的臥室和工作室。这里一切的陈設都是魯迅生前所用的原物，是經許广平先生按照当时的情形布置的。使人看到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的工作室，是多么簡單朴素啊：靠东牆摆着一張極普通的三層長桌，桌上放着几件文具，一个鬧鐘和一盞煤油灯，桌前摆着先生特地找人定制的藤椅子。故居管理員說，先生工作到了疲倦的时候，有时順便一仰头，枕着那靠背椅閉上眼睛休息一会。更使人感动的是先生睡的床鋪，只兩条長木板湊成的一副單人鋪板，鋪板上鋪的褥子大約不过一指厚。床底下还放着一个陈旧的竹編的網籃。这个網籃是魯迅在当时为应付反动势力对他随时可能施加的迫害，以便利用它帶着簡單的衣物即时离家出走。偉大的文学家魯迅就居住在这样异常朴素的工作室里，在文化战綫上与敌人作战。他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和衣打个瞌睡，便又繼續写下去。在这屋住了兩年多，他除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和充当教育部僉事外，完成了“墳”、“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續編”和“彷徨”中一部分文章，还翻譯了許多外国文学作品，同时又主編“莽原”等杂志，給中国人民留下了無价的文化遺產。

在工作室的牆壁上，悬有一張魯迅在日本留学时的教授藤野先生的照片。在書桌对面的牆上，还挂着一張司徒乔先生所画的素描。这幅画是描写当时反动統治区四个警察驅逐

一个帶孩子討飯的妇女。这幅画是魯迅在上海發現后花了四元錢买下的，1929年回北京时帶來挂在床前，至今未动。他不远千里把这張画帶到北京，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反动統治者統治下的社会那种痛恨的心情。

南房是会客室，設有供客人住宿用的床。魯迅經常在这里或工作室里接待他所热爱的青年們。許多会見過魯迅的人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無論在什么时候，先生对于革命青年都是热忱相待。甚至半夜里有人來訪也从不拒絕。他时常告訴青年們怎样鍛煉自己，又怎样打击敌人，鼓励青年們英勇頑強地去和敌人搏斗。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反动政府槍杀請願学生的暴行，激起了先生無限的憤慨！深夜里在油灯下，悲憤地写下了“記念刘和珍君”这篇傳誦感人的文章，号召青年們繼續斗争。屋里牆上还挂着一張魯迅先生和他的学生們的合影，其中就有刘和珍先烈。

看过魯迅先生的遺迹，回忆起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先生对敌冲鋒陷陣的战斗意志，不禁令人对这位文化上的巨匠肅然起敬。



北京魯迅博物館

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是北京人非常熟悉的地方。在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的時候，瞻仰“魯迅故居”的人群，從阜成門大街踏上一條新辟的平坦寬廣的道路，直達這條僻靜的胡同，遠遠就望見緊靠“魯迅故居”東邊的空地上，一片樹木掩映中出現了一座乳黃透綠的高大建築物。它就是新建的魯迅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包括“魯迅故居”在內，總的基地面積有13,000平方公尺，除已落成的主要建築物——陳列廳外，還要建築魯迅作品的研究室等，使這裡成為學習魯迅、研究魯迅最好和最完備的學校。我們從這所紀念性建築的外貌，可以深切的体会到魯迅先生終生的朴素生活的風格。一年前，北京設計院的工程師們經過反復研究，為博物館設計了十三個圖樣，多次請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提出寶貴的建議，還廣泛征求了首都文藝界、美術界人士的意見，才確定了現在的建築圖樣。整個博物館的布局十分朴質、幽美，采

取了富有民族風格的庭院形式。跨進博物館大門，在寬闊雅靜的庭院里，園藝工作者用花草樹木在這裡點綴成富有詩意的境界。花叢里，栽植了魯迅先生生前喜愛的丁香、刺梅，現在也都枝葉繁茂的生長起來了。

博物館陳列廳是一幢長方形建築物，外部色彩調和，型體美觀，在房檐下的窗口上方，雕塑着象征和平的橄欖枝葉，沐浴在陽光照耀中，顯得多么莊嚴肅穆，又是多么朴素大方。

踏上陳列廳台階，由正門進去，正中放着一座巨大的魯迅雕塑胸像，迎面的牆上嵌在子午蓮圖案邊框里，一行行金光閃閃的大字，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語錄：“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綫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這裡無數珍貴的照片、圖畫和實物再現了魯迅先生一生光輝的事跡，對於中國人民，尤其是今天生活在幸福時代的青年們是很好的學習榜樣，回憶起這位文化巨人生前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鬥爭生活，也是鼓舞我們前進的力量。

魯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誕生在浙江紹興。

魯迅故鄉——紹興的秀麗景色展現在人們的眼前。在一張“紹興東昌坊口新台門”的照片上，看到七十五年前一個偉大的生命降生的那間屋子；被魯迅在“朝花夕拾”里稱為我的樂園的“百草園”的照片和美麗的圖畫，引人想起了他的童年生活；陳列着的物件里有魯迅母親當時給他的紀念物——牛繩和銀飾，據迷信說，把它帶在身上，小孩子才能順利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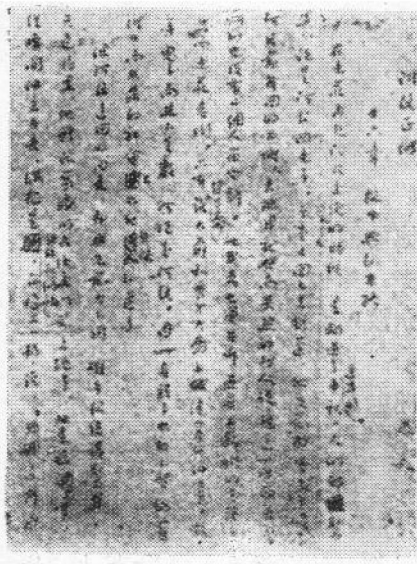
又可看到先生童年时爱看的“鑒略釋義”、“山海經”、“目連記”和用荊川紙描繪過的“西游記”等讀物。魯迅幼年讀書的“三味書屋”和塾師壽鏡吾先生的照片，會使人聯想到魯迅先生作品里所描寫的書房的情景：當中桌邊坐着的壽老先生，仰著頭入神的誦讀他的“鉄如意指揮倜儻……”，坐在兩旁桌子邊的孩子們，又在把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了。也許，魯迅先生正在偷偷地描畫“東周列國志”等小說上的綉像哩。

1898年魯迅便離開自己的家鄉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去學海軍，後又改學開礦。這裡保存著他當年手抄的講義“水學入門”、“幾何學”和一份優等成績的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的畢業文憑。魯迅來到南京，正趕上康有為、梁啟超提倡變法維新。參觀的人們在一個玻璃櫃內，看到魯迅當時貪婪地閱讀過的鼓吹維新思想和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的書刊——“時務報”、“原富”、“黑奴吁天錄”、“巴黎茶花女遺事”等，其中嚴復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對魯迅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從那時起，他開始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掛著的一幅魯迅五十一歲時所寫的他二十一歲時作的七言詩屏條：“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參觀的人們讀了一遍又一遍，體會出魯迅在青年時代愛國的抱負。接著展出的照片和實物向人們介紹了魯迅1902年後在日本留學的情形。陳列品里格外引人注意的是一本魯迅在仙臺學醫時手抄的解剖學筆記，上面還有他的老師藤野先生用紅筆添注改正的筆迹。魯迅早年這件珍貴的遺物は許廣平先生解放後在紹興故居發現的。當時，魯迅受到現實生活的刺激，認為學醫醫了身體醫不了精神，對國家民族是無補於事的，決心放棄了學醫從事文學的活動。一本五十三年前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雜誌上，刊載

有魯迅根据希臘故事写成的富有爱国精神的小說“斯巴达之魂”。在这里人們看到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的相片，他們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普希金、萊蒙托夫和契訶夫，匈牙利的裴多斐，英国的拜倫和雪萊，波蘭的显克微支和密茨凱維支，日本的夏目漱石，使人想到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来”一文中所說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蘭，以及巴尔干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別多。”在那个时候，魯迅和反清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發生了联系，曾和錢玄同一起听过章先生講的“說文解字”。但重要的是受到了許多思想影响，后来就經過他的介紹，参加了反清的革命組織光复会。这里陈列着章太炎的照片、著作，一幅章太炎書贈魯迅的条幅边，有魯迅手抄的“說文解字”講义，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記叙中，魯迅說：“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經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駁斥康有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前去听講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問的革命家……”。

辛亥革命前二年，魯迅由日本回国，前后在杭州浙江兩級师范学堂和紹兴府中学堂任教，1912年到了北京。玻璃櫃中陈列着魯迅三次手校謄录的“嵇康集”和“直隶現存汉魏六朝造象目录”等厚厚的几册抄本，都是他在教育部任僉事时，公余時間的劳績，流露出他在辛亥革命失敗后的思索和沉默的心情，也表現了他很早就重視我国的民族文化遺產。在这里展出的一張紹兴县館“补树書屋”的照片，就是那时在朋友的督促下写出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地方。發表这篇小說的“新青年”杂志也在这里陈列着。这是一篇对封建旧礼

教傳統觀念有力的宣戰書。從此，他和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傳播者李大釗相往來，經常熱心為“新青年”寫稿。魯迅在“南腔北調集”中自選集自序里的話表明了他和“新青年”的因緣：“我做小說，是開手於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人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從一份1921年12月的“晨報副刊”上可以看到魯迅以



“巴人”筆名發表的不朽的傑作“阿Q正傳”第一章。參觀的人們久久不忍離去，細心地讀着這篇文章的片斷，看看先生寫出這部輝煌著作的簡單而朴素的工作室照片和影印的原稿手迹等。它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道路上的里程碑，“是舊中國勞動人民的奴隸生活的深刻寫照，也是中國近代民族被壓迫歷史的縮影。”（1952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社論）這裡還有魯迅特為“阿Q正傳”的俄文譯本寫的序。在挂着畫家艾中信畫的“祝福”插圖旁邊，還看到最初發表“祝福”一文的那本“東方雜誌”的影印片。

人們圍着北京“魯迅故居”的模型，看着“老虎尾巴”這間工作室和挂在玻璃櫥里的幾件衣物，回憶起先生在這裡居住

的兩年另三個月期間的生活。他不但在北京大學等學校擔任教職，還孜孜不倦地辛勤勞動，写出了八部文集里的作品，翻譯了三部書，同時編輯“國民新報副刊”、“莽原”、“京報民眾文艺周刊”等刊物。他拿起犀利的筆，不知疲勞地向舊社會展开了英勇的戰鬥。1925年春，女師大發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專橫壓迫和她非法開除六名學生的事件。魯迅熱情地支持了學生們這一正義鬥爭，代學生寫了兩份呈文，一份是用黑格毛邊紙寫的，一份是用懿文齋紅格紙寫的。

當“五卅”慘案發生後，魯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表達了他的憤慨，嚴正抗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這裡還有“語絲”上發表的充滿憤激的心情和對青年的關切同情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的影印片。看過這些展品，不只是加深了對魯迅先生的為人及其文章的深刻了解，而且同樣產生了对反動統治者的仇恨。

魯迅一向寄其深厚希望於青年一代。從1920年起，他先後在北京一些大學兼課，又經常应邀去各校講演，辛勤地為青年閱改文稿，這裡可看到他給韋素園修改的“外套”譯稿和他給韋素園、陶元慶的信。這時，先生和青年的文艺愛好者組織“語絲社”、“未名社”和“莽原社”等社團，編印文艺書刊。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竟因此遭到反動勢力的迫害，离家避難。1926年8月又被迫離開北京，到了廈門大學。半年

